

政治、權力與批判：民初劉師復派 無政府團體的抵抗與追求

周麗卿

摘 要

本文以民初劉師復派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刊物為個案，說明他們的民權主張、無政府思想，透過雜誌形成一種思想動員的力量，是對政府當局的一種抵抗，也因而受到當局的迫害，甚至被貼上「過激派」的標籤。在這樣的政治風險之下，他們如何因應現實政治而產生新的能動性，甚至在漳州推行文化運動，被譽為模範區，值得進一步考察。其次，在五四運動之後，除了抵抗政府之外，劉師復派無政府主義團體必須面對的新課題，是如何回應社會主義內部的路線之爭，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路線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產生扞格的國家、權力、階級等問題。透過上述問題的思考，將有助於理解民初最富盛名及影響力甚大的劉師復派無政府主義團體，對中國政治道路的獨特洞見與追求。

關鍵字：劉師復、無政府主義、陳獨秀、馬克思主義

Politics, Power and Critique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sistance from and Pursuit of Anarchist Groups Affiliated with Liu Shi-fu

Li-ching Chou^{*}

Abstract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various publications by anarchist groups affiliated with Liu Shi-fu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is essay illustrates that those anarchist groups which chose to express their arguments for civil rights and anarchist ideas through publishing magazines in order to generate an impetus for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in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nation state, were faced with subsequent suppression and coercion by the authority, and were being labeled as “radical groups.” It is then necessary to further investigate how these anarchist groups still managed to cope with such political reality and risks, to engender new initiatives, and even to promote cultural movements in Zhangzhou(漳州).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addition to resistance to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he anarchist groups affiliated with Liu Shi-fu also had to cope with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gether with their own sort of problem of how to respond to fellow socialists’ internal struggles over the blueprints or roadmaps, particularly those concerned with nation-state, power and class issues that were in conflict wit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enshrined by Marxism. This essay strongly suggests that a thorough thinking over these questions above with respect to the insight and pursuit of these anarchist groups affiliated with Liu Shi-fu would greatly facilitate further grappling with Chinese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Liu Shi-fu (劉師復), Anarchism, Zhen Du-xiu (陳獨秀), Maxism

* Ph.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政治、權力與批判：民初劉師復派 無政府團體的抵抗與追求*

周麗卿**

壹、民初時代風雲

時間拉回到民國初年，由於「臨時約法」的變通條款賦予袁氏政府有權因緊急狀態或其他原因限制人民的權利。因此，從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後，對於有違其專制統治之言論，即雷厲風行地予以禁止，一再迫害報界，封閉報館，並建立起現代最早的新聞檢查制度。當時不單是國民黨系的報刊遭到禁刊，其他疑似反政府言論的報刊雜誌，一律在查禁之列。雖然後人認為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對言論出版自由之管制較為寬鬆，但其實是有時間上的區隔：二次革命之後，袁氏變本加厲，凡不利其帝制言論，或侈談國體問題者，一概查禁；¹ 直到袁氏過世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廢止「報紙條例」，報界才獲得較為寬鬆的環境。然而「報紙條例」雖然取消，但政府並無意放棄對輿論的控制，明令官方消息非經國務院「正式宣布，不得任意登載。」² 說明報刊輿論仍處在軍閥政府的威脅、控制之下，沒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 本文定稿的完成，受益於兩位匿名審查人建設性的批評與建議，使本文思路更臻完整，謹致謝忱。至於拙文中所有不足之處，全責在我。

收稿日期：2014年2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4月11日。

** 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¹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學生書局，1964年再版），頁241-242。

² 〈限制報館與籌備國會〉，《申報》，上海，1916年7月25日，版3。

因此，本文以劉師復（1884-1915）³ 派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刊物為個案，說明其民權主張、無政府思想，透過雜誌形成一種思想動員的力量，是對政府當局的一種抵抗，也因而受到當局的迫害。在這樣的政治風險之下，甚至被貼上「過激派」的標籤。於此，他們如何因應現實政治而產生新的能動性，在夾縫中求生存，同時創造出更大的影響力。這是考察他們政治言論內涵時，必須參照的一個思考角度，如此方能更具體地說明他們回應、批判現實政治的張力。

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時代巨輪駛向一個民意沸騰的年代，再也不讓軍閥擅政專美於前。1919年巴黎和會後，當時知識青年對軍閥政府的憤怒、絕望，加以世界性的潮流推波助瀾，各種社會主義（包含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廣義的社會主義流派）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中國滋生。對於政府、階級、權力的批判，各派社會主義對於解決中國問題方法論的歧異逐漸浮上檯面。而劉師復派無政府主義團體對於當時日漸興起、以陳獨秀為首的馬列主義俄國路線，彼此的左派路線之爭，更是當時社會主義論戰的重要一環。本文將從劉師復派無政府主義團體的視角來看馬列主義在中國在地化的實踐策略，中間將擦撞出什麼樣的火花？以下先從民初無政府派的代表人物劉師復談起。

貳、民初無政府主義的興起：劉師復及其時代選擇

無政府主義於民初再度興起，有其現實政治的特殊背景。民國成立之際，南北和議對袁世凱政權的妥協，辛亥革命的不澈底與當時的政治烏雲，導致一些革命黨人極度失望，使他們逐漸傾向無政府主義。⁴ 民初無政府主義者主要來自兩

³ 劉師復原為清末革命黨人，民國之後眼見當時政治的腐敗，創辦心社、晦鳴學社，為民初重要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五四時期主要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多為劉氏的追隨者，蔣俊、李興芝在《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將其列為「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92-193。

⁴ 相關討論參見蔣俊，〈民國初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收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山東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編，《中國哲學論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43-169。

大團體：其一是由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分化出來的社會黨，⁵ 其反對袁氏政府，主張以生計革命代替政治革命；⁶ 其二為劉師復團體，主張廢除政府，實行平民革命。其中社會黨對於辛亥革命後的成果為袁氏所奪，深感不滿。在該黨刊物《社會世界》第一期即以〈顧無為大罵袁世凱〉為題，指出：「所謂共和政體，乃一非牛非馬之政體，所謂民國者，乃一不倫不類之民國也，此咎誰實尸之！非民賊之袁世凱其疇也耶？」⁷ 批判造成民國共和政體走樣的原因，矛頭直接對準袁世凱。在下一期題為〈革命夢〉的小說中，再度提出革命的命題：「共和的政體仍行你們專制之政策，共和的總統仍做你們帝王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永遠為牛馬不能革命嗎？」⁸ 反思的是在共和政體下仍行專制、帝王之實，由此而有革命的正當性。然而，他們所提出的革命已不是政治革命、種族革命，而是使人民安生遂志，免於飢寒困苦的生計革命。⁹

自1913年8月後，由於社會黨成員遭殺害，其中一部分人與劉師復團體合流，¹⁰ 下文將提到的實社成員華林，即是社會黨的成員。從辛亥革命後滿懷希望成立新政府，到袁氏篡權；從反對政府，到反對一切政府，與社會黨的時間相仿，觀點相近的是民初最富盛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成立晦鳴學社、心社，試圖以道德改造人心，進而改造社會，作為其救國救民的途徑。¹¹

劉師復曾為革命黨成員，也加入同盟會，曾組織支那暗殺團，計劃暗殺袁世凱。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認為民族革命已完成，接下來的目

⁵ 社會黨以極端社會主義為宗旨，以消滅階級、破除界限為綱。見〈社會黨綱目說明書〉，原載於《良心》，第1期（1913年7月20日），徵引自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251-253。社會黨重要出版物有《社會世界》、《良心》、《人道周報》、《極樂地》，代表人物有沙淦（憤憤）、樂無（太虛法師）、魯哀鳴、徐安鎮、華林等人。

⁶ 中國社會黨與其分化而出的社會黨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對待袁氏專權的態度。中國社會黨冀望袁氏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社會黨則堅決反對政府。

⁷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148。

⁸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148。

⁹ 叔鸞，〈中國革命原論〉，《人道周報》，第14、15期，徵引自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43。

¹⁰ 如1914年初《民聲》在澳門被禁，在原社會黨成員徐安真的建議和幫助之下遷往上海。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175。

¹¹ 張九海即指出：「劉師復無政府主義是對民國初年社會現狀的一種疏解，是對辛亥革命現實政治的一種反動。」。見氏著，〈內容提要〉，《執著的烏托邦追求——劉師復無政府主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1。

標應是社會革命，捨棄一切暴力手段。¹² 根據劉師復之弟劉石心所述，劉師復組織心社和晦鳴學社，從思想上來講，與辛亥革命前他受到《新世紀》及托爾斯泰的影響有關；但是企圖解決革命後的現實矛盾，也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劉師復在革命後看到新政權內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情況，¹³ 使他對政府及官吏產生反感，產生道德救世的想法，從而組織宣傳道德修養的組織心社。¹⁴ 特別是在袁氏政府解散社會黨及槍殺其成員陳翼龍後，劉師復發表〈政府與社會黨〉一文，指出：「吾人于此，當亦可以洞見政府之與人民，法律之與自由，固純然兩不相容之物，而勿復再作政治神聖之夢想矣。」¹⁵ 政府法律與人民自由互相對立，至此千真萬確。因此劉師復主張廢除政府，發表〈無政府淺說〉，直指政府為「剝奪自由擾亂和平之毒物」，¹⁶ 為其無政府主張定調。

其次，劉師復反對政府，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因為「有政府之世，人民必無真自由」；¹⁷ 他也反對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認為只是「利用多數黨員之聲勢，製造黨魁之名譽」，主張不應建立政黨，應強調個體的自由獨立。¹⁸ 那麼，針對革命黨所發動的二次革命，劉師復的看法又是如何？他當時所寫的〈政

¹² 王聿均訪問，謝文孫記錄，〈附錄一：回憶師復〉，收入《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42-52；劉石心，〈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929；馮自由，〈香港支那暗殺團成立始末〉，《革命逸史》，中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頁763-764。

¹³ 馮自由亦指出劉師復「鑒于舊日同志之熱衷權利，乃發憤宣傳無政府學說，以為敝屣功名之倡。」馮自由，〈心社創作人劉師復〉，《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頁320。

¹⁴ 「心社」的發起者為：師復、彼岸、紀彭，立戒約12條，包含：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坐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海陸軍人、不奉宗教等。見〈心社趣意書〉，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35-239。從其內容來看，心社為企圖以道德改造社會的組織。

¹⁵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劉師復為政府解散社會黨及槍殺陳翼龍發表〈政府與社會黨〉文〉（1913年8月27日），《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7。

¹⁶ 師復，〈無政府淺說〉，《晦鳴錄》，第1號（1913年8月20日），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70。

¹⁷ 師復，〈政治之戰鬥〉，《晦鳴錄》，第1號（1913年8月20日），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77。

¹⁸ 師復，〈論社會黨〉，《民聲》，第9號，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95。

治之戰鬥〉一文即針對二次革命的利害得失有所評論。該文主要討論政治戰鬥與社會主義衝突的問題，認為討袁係源自政治之競爭。¹⁹ 在劉師復看來，無論是袁世凱或孫文、黃興登上總統之位，都是以暴易暴的強權，²⁰ 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不贊成二次革命，主張「從事于反對政治之社會革命」，透過和平方式的社會革命改造社會，使人民獲得真正幸福。²¹ 並在〈無政府共產主義宣言書〉中特別指出革命的意義：「革命者，非但起革命軍之謂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之實力，以與強權戰鬥之一切行動，皆曰革命。」²² 強調實行革命的能動主體為平民，提出不同於革命黨的政治革命路線，而以平民革命的直接行動對抗當前的強權——袁氏政權。

此一平民革命的理念，之後在劉師復團體的刊物實社《自由錄》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在〈平民革命〉一文中指出：「專制政府固惡，即共和政府亦未必善」，雖然共和政府表面上有議會監督，實為政客欺人之言。事實上，他們所關心的是權位的高低、薪俸的多寡，國利民福只是口頭禪。矛頭正是指向當權的北洋軍閥政府，在共和民主政治的表面空殼下，濫用威權、妄施號令。因此，他們主張「由平民多數之覺悟」，或單獨進行，或聯合舉動，以打造一個真正平等、自由、博愛的無政府共產社會。²³

劉師復據此否定政治，而其政治的內涵實為政府及官吏，因此他以不參與政治的姿態來從事社會革命的改造，但其核心關懷仍然是對當時政局的改造與超越。在劉師復的影響下，廣州、香港、新加坡等地紛紛成立相關組織：在廣州以劉石心、區聲白、黃凌霜等建立廣州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會，袁振英在香港成立大同社，梁冰弦在新加坡編輯《正聲月刊》。²⁴ 區聲白、黃凌霜、袁振英、梁冰弦即是下文將提到的實社成員。然而，如此面對政治的思想及姿態，勢必不為當

¹⁹ 師復，〈論社會黨〉，《民聲》，第9號，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278。

²⁰ 〈答英白的信〉，《民聲》，第8號（1914年5月2日），頁11。

²¹ 師復，〈政治之戰鬥〉，《晦鳴錄》，第1期（1913年8月20日），頁10。

²² 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無政府共產主義宣言書〉，《民聲》，第17號（1914年7月4日），頁2。

²³ 聲白，〈平民革命〉，《實社自由錄》，第2集（1918年5月），頁8。

²⁴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176。

權者所容。因此，他們面對如此高的政治風險，如何因應？將攸關他們能否存續的關鍵。

叁、無政府派刊物的政治風險與能動性

在1912年夏、秋間，中國社會黨在北方受到政府干涉，在漢口、長沙的支部也先後受到黎元洪、譚延闓的破壞，甚至江亢虎本人也在漢口遭到逮捕。²⁵ 劉師復為此發表〈劉師復為政府解散社會黨及槍殺陳翼龍發表〈政府與社會黨〉一文中指出：

去年十二月間，新社會黨發表未及一月，即被袁世凱下令解散。至本月四日，中國社會黨黨員陳翼龍在北京被逮捕槍斃，袁氏復下令解散全國社會黨。先後八越月間，以大總統命令解散社會黨者二次，斯誠支那共和國唯一之特色。²⁶

中國社會黨及其分化而出的社會黨，成立不久即因政府嚴格取締而土崩瓦解，這是劉師復諷刺民國作為共和國的特色，集會結社的人民自由形同虛文。政府的密探不但亦步亦趨地掌握社會黨的動態，對師復派的刊物亦然。

稍早於中國社會黨，劉師復在廣州成立晦鳴學舍，並於1913年8月在廣州出版刊物《晦鳴錄》，不久就遭到當局的查禁。同年9月，袁世凱下令禁止出版，指斥該刊「所標綱要有曰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種種悖謬之語，不一而足，……應將該學會勒令即日解散，並將發之《晦鳴錄》勒令永遠停版。一面分別懲治，以儆將來。」²⁷ 由於政府的查禁，《晦鳴錄》在內地無法出版，被迫遷往澳門，並改名為《民聲》，以避當局的迫害。不久，袁世凱又令外交部照會葡萄牙領事，函請「澳督解散晦鳴學社，

²⁵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153。

²⁶ 該文發表於1913年8月27日，徵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6。

²⁷ 〈晦鳴學社解散之令文〉，《申報》，上海，1913年9月21日，版6。

並勒令《晦鳴錄》停版。」²⁸ 晦鳴學舍不得已於1914年初，在原社會黨成員徐安真的建議和幫助之下遷往上海，對外托言東京出版。該期上海編輯的《民聲》刊首登載〈編輯啟事〉指出：「中國內地之現象，豺狼當道，民賊塞途，本報主義既為所忌，故不便明設代理，唯望閱報諸同志展轉或介紹知友來函訂閱。」²⁹ 可以看出《民聲》的出版受到政府很大的壓力，因此必須透過各種偽裝瞞過政府當局的檢查。當時劉師復即告誡中國無政府主義同志：

凡我同志，當在其所在地，與宗旨相同者聯絡為一，相其情勢，創設自由結合之團體或為秘密之組織或為表面研究學術之機關，以為傳播主義聯絡同志之機關，以為將來組織聯合會之預備。³⁰

亦即，必須權衡形勢，善加應變，以利出版順利，可見無政府團體的行動能力。劉師復過世之後，民聲社成員或北上求學或負笈國外發展，其中數人以北大為根據地，發展無政府主義，即是北大實社。

北大實社開始受到當局注意，是因1917年10月11日《時事新報》刊登了一則新聞〈北京大學之無政府主義〉，子標題為「教育部其知之乎」。文章一開頭就指出接獲一印刷品《實社自由錄》，由李煜瀛（李石曾）題名，主張無政府主義，並轉引實社的章程及列舉吳敬恒（吳稚暉）的序跋。記者並在文後加一評語，認為實社以研究無政府主義為範圍，只不過是一種「感情的論調而已」；而此種感情最易敗壞青年思想，因而敦請教育當局注意。³¹ 另外，署名「心聲」的作者亦對此消息同步發表評論指出：

無政府主義勿論為理論，抑為實行，凡在有政府之國，要皆懸為厲禁也。不意我國竟有公然以無政府主義相結社者，命其名曰實社。發布宗旨號召黨徒並通告其機關在北京大學，吁可異也已。

²⁸ 〈函請葡官解散晦鳴學社〉，《申報》，上海，1913年11月18日，版7。

²⁹ 《民聲》，第5號（1914年4月11日），頁1。

³⁰ 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無政府共產主義宣言書〉，《民聲》，第17號（1914年7月4日），頁2。劃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³¹ 〈北京大學之無政府主義·教育部其知之乎〉，《時事新報》，上海，1917年10月11日，版次不明。

我教育當局對於此舉動，毫無察覺，其過失終不能掩也。³²

顯示該文作者認為無政府主義社團不但應嚴加聲討，而且該社團竟設在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教育當局不能免其責。1917年袁氏已過世，黎元洪主政的時代，言論自由出版較鬆；但等到段祺瑞執政，宣布袁氏頒布的新聞法律仍然有效，而且從1917年5月開始實行報刊、郵電檢查，無政府主義刊物乃在禁止之列，這是「心聲」點名批判政府督察不力的理由。

當時《時事新報》轉引的是甫發刊不久的《實社自由錄》第一集。在第二集中，黃凌霜發表〈少見多怪之《時事新報》〉一文，並澄清指出：該社原推太侔為通信處，後來太侔南歸，通信處改為上海，以茲證明「本報與北京大學毫無關係」，並在《時事新報》刊出此新聞後隨即登報聲明。³³ 在此一訊息盛傳之際，北大也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以破除謠言：

本月十一日上海《時事新報》有〈北京大學之無政府主義〉一文，北京之《新民報》、《公言報》亦轉載之，其所依據者僅《實社自由錄》中有「本社通信暫寄北京大學太侔君」十二字耳。本校正在調查太侔究為何人，今見十八日《順天時報》有實社廣告言「太侔早已南旋，實社通訊處已移設上海」，是不特實社與本校從無關係，即太侔個人與本校亦久已斷絕關係，各報所載，顯系誤會，特此聲明。³⁴

事實上，這4位實社列名發起人中，太侔、震瀛（袁振英）都是北大的學生。黃凌霜發表〈少見多怪之時事新報〉一文，為避免給北大帶來麻煩，因為無政府派的出版品早在1916年5月即在查禁之列。³⁵ 而北大實社事件的發生，實社成員與北大極力撇清關係，正說明無政府主義與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有所衝突。五四時期，實社發行的《自由錄》雖只是一本小冊子，但其影響力之大，使得胡

³² 心聲，〈時評二·無政府主義〉，《時事新報》，上海，1917年10月11日，版次不明。

³³ 凌霜，〈少見多怪之時事新報〉，《實社自由錄》，第2集（1918年5月），頁83-87。

³⁴ 「北京大學廣告」，《公言報》，北京，1917年10月20日，版次不明。

³⁵ 官方的查禁可以參考〈交通部關於查禁《無政府淺說》、《平民之鐘》等印刷品飭〉，1916年5月1日。查禁的印刷品除了《無政府淺說》、《平民之鐘》，尚包含〈上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同志社致無政府黨萬國大會〉兩篇文章。徵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頁18。

適在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即直接點名《自由錄》，³⁶ 巴金日後在其回憶中亦指出《自由錄》對他的影響極深。³⁷

實社《自由錄》只出版兩集，後來為避免徒耗人力，1919年1月實社、民聲社、群社、平社合併為進化社，並出版《進化》月刊，³⁸ 以加強無政府主義組織的力量。《進化》之銷售量甚佳，但是該年3月即被禁刊，且封閉民聲社郵箱。成員之一的鄭佩剛回憶指出，郵箱雖被查封，但其他通訊機關依然存在，因此來信索書報者仍源源不絕，並且在包寄書封的封條上，印上佛學社、靈學報、孔教會等名目來偽裝。³⁹ 無政府主義刊物利用復古派的組織刊物作為掩護，以避當局的耳目，說明復古派的刊物、思想，方為當局認可。可見當時主張或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團體必須善加偽裝，方能組織團體、發行刊物。因此，「報紙條例」雖已取消，但報刊雜誌及組織團體仍處在軍閥政府的威脅、控制之下，沒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五四運動過後，更形變本加厲，嚴厲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⁴⁰ 更壓縮集會與言論自由的空間。

肆、過激黨、無政府黨與師復派無政府團體的連帶性

當時中國原指俄國布爾什維克為過激黨，也將本土的無政府主義者視同過激

³⁶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版1。

³⁷ 巴金，〈我的幼年〉，1959年5月，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1004。

³⁸ 《進化》共出3號（期），第3號即定為「師復紀念號」，黃凌霜於該號發表〈師復主義〉一文，重申劉師復的主張。

³⁹ 鄭佩剛，〈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若干史實〉，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952-953。

⁴⁰ 〈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之經過〉，《每週評論》，第24號（1919年6月1日），「國內大事述評」欄。下文將詳述。

黨，是軍閥政府急欲剷除的對象。然而從陳獨秀、⁴¹ 胡適⁴² 的例子看來，政府對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實驗主義等新思潮之概念籠統而沒有加以區分。一旦被冠上「無政府黨」、「過激黨」的標籤，在五四風潮後，更成為政府當局查禁的刊物與嚴加注意的對象。

受到五四運動衝擊的北洋軍閥政府，為了維持其統治，更加緊對思想言論的控制，以防各種激進思想的傳播，尤其是無政府主義。當時《新青年》的另一週報《每週評論》於「國內大事述評」一欄發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之經過〉一文，指當局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雜誌、出版品等一概在查禁之列，理由是：「把那些妨害治安、敗壞風俗、『專以鼓吹社會革命、無政府、同盟罷工、共產等邪說為宗旨』的《進化》雜誌、《民聲》叢刊、《工人寶鑑》、《太平》等印刷品，一律查禁。」⁴³ 甚至只因日本公使以照會責問中國政府，即將愛國輿論、反日思想都列入鼓吹無政府主義之列。陳獨秀針對此事，撰寫〈對於日使照會及段督辦通電的感言〉一文，指日使將「政府懦不能恃」、「國民急圖自決」、「與日本斷絕工商業並各友誼的關係」、「國家興亡之責全由吾人肩負」、「同人合力以補政府之不及」等列為鼓吹無政府主義，其言論之荒謬。⁴⁴ 當期陳獨秀對於政府以入人於罪的方式，羅織「無政府黨」罪名的情形有一深入的剖析：「從前清朝未倒的時候，官廳捉人，私人害人，不論青紅皂白，都用『同盟會』三字做罪案。……如今想傾陷人的又換了一種罪名做武器，叫做什麼『無政府黨』。」⁴⁵ 「無政府黨」的標籤如同前清同盟會，成為政府當局陷害反政府者的工具。

五四運動過後，政府對散播不利於政府言論者，不再只是謠言恫嚇，而是直

⁴¹ 1920年初，報紙的報導即指陳獨秀在武漢宣傳無政府主義，見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合肥：安徽教育，2005年），頁268。

⁴² 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指出：「在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版1。

⁴³ 〈查禁「妨害治安」的集會出版之經過〉，《每週評論》，第24號（1919年6月1日），「國內大事述評」欄，版1。

⁴⁴ 隻眼（陳獨秀），〈對於日使照會及段督辦通電的感言〉，《每週評論》，第24號（1919年6月1日），版2。

⁴⁵ 陳獨秀，〈同盟會與無政府黨〉，《每週評論》，第24號（1919年6月1日），版3。

接拘提或禁止刊物發行。1919年5月，劉師復團體成員鄭佩剛、區聲白等人即被捕入獄。對於無政府派相關刊物，政府既視之為「過激主義」，更嚴格予以查禁，胡適即指出當時中央、地方軍閥政府查禁無政府派刊物的盛況：「大家都痛罵痛恨『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⁴⁶

從《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上收錄當時官方的查禁命令可知，此一盛況，絕非言過其實。茲臚列如下：

〈交通部關於查禁《進化》、《工人寶鑑》⁴⁷等印刷品訓令〉，1919年5月5日。

〈楊善德檢送《兵士須知》⁴⁸致參陸辦公處函件〉，1919年6月11日。

〈內務部等關於嚴密查禁《兵士須知》函電〉，1919年6月。

〈國務院等為嚴密查禁《民聲叢刻》⁴⁹及北京《實社自由錄》有關文件〉，1919年6月。

〈盧永祥關於查獲無政府黨人在滬活動等情致京師警察廳函〉，1919年7月20日。

〈國務院等為從嚴禁《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⁵⁰等七種印刷品有關文件〉，1919年8-9月。⁵¹

透過時任直隸督軍的曹錕發給國務院的密電，即看出查禁的理由：

比因外交、內政險象環生，學、商各界風潮雖已漸就平息，而群情浮動，事雜言龐。激黨外潮浸淫輸入，奸人復乘機煽惑簧鼓其間，遂有種

⁴⁶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版1。

⁴⁷ 鄭佩剛編，《工人寶鑑》（上海：民聲社，1917年）。

⁴⁸ 1919年無政府主義社團真理社印行。

⁴⁹ 鄭佩剛編，《民聲叢刻》（上海：民聲社，1917年）。

⁵⁰ 黃凌霜在1918年翻譯克魯泡特金《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進化社出版。

⁵¹ 本段引文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上收錄的官方與警察局報告，頁19-33。本文僅收錄至1919年底，1920年之後的查禁《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亦有收錄，可參見該書。

種印刷品之散布，……其尤堪注意者，則為鼓吹勞動界之結合，實為破壞擾亂之導線也。方今商民凋敝，生計維艱，人心惶惑。此等莠言若任其廣為傳播，青年理想固已易入歧趨，而無賴不逞之徒或且藉端號召，擾害治安，星火燎原，大亂駭至。⁵²

曹錕等人及各府院是站在政府的立場，指責無政府黨人乘機擾亂人心，是破壞國家、妨害社會安定的行為；但是楊增新（1864-1928）從另一視角，看出無政府派的生成有其社會背景，他在電文中指出：

民國成立，竭人民之脂膏，以為養兵之費，兵愈多，而民愈窮。室于民無以為生活，則怨氣彌漫，亂機四伏，土崩瓦解，在在堪虞矣。今日之勢，對於傳播無政府主義之印刷品，及其他意圖破壞治安之行為，固當並行取締，力為制止，以治作亂之際；尤當節省軍費，加意民生，以治思亂之本。……若徒擴張軍備，借債養兵，以搜括為政策，以兵多為可恃，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誠恐民心離散，亂亡無日，其可畏者不特傳播無政府主義已也。⁵³

楊增新已經看出無政府派的生成，關鍵在於養兵愈多而民愈窮，導致民心離散，解決之方尤在於節省軍費，加意民生，以治思亂之本。楊增新的意見，其實正是當時知識分子希望廢督、裁兵的共同心聲；但此一意見證諸史實，並沒有被接納。

因此，在《進化》被禁，師復派成員相繼被捕之後，稍後於天津創辦的刊物《新生命》，已不敢公開宣揚無政府主義，只是籠統地說明刊物的目的在於除舊布新：破壞方面，在批評一切不良的、舊的風俗、習慣、制度、禮節以至人物、行為、言論；建設方面，在組成一個以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為基礎的新社會。⁵⁴ 在宣傳手法上更為低調，儘量不引起當局的注意。但《新生命》不久後仍

⁵² 〈國務院等為嚴密查禁《民聲叢刊》及北京《實社自由錄》有關文件〉（1919年6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頁31。

⁵³ 〈楊增新關於防範無政府主義思潮傳播電〉（1919年9月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頁34。

⁵⁴ 黃劍生（黃凌霜），〈《新生命》發刊詞〉，《新生命》，第1期（1919年11月1日），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

被查禁，後來在其中興號將此緣由作一說明：

不幸得很，出版三期，即遭天津警察廳電風厲行的禁止發行，蓋因正值俄國的布爾札維克奪取了政權，實行勞農專政，中國當局，辨不清楚清黃皂白，指鹿為馬，亦就將安那其主義認為布爾札維克，視為一律的洪水猛獸，可憐一個剛從母胎呱呱墮地的安琪兒竟遭摧殘夭折而幻滅了。⁵⁵

說明政府將安那其主義誤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之流的過激派，因而嚴格取締，是其飽受政治壓迫的重要原因。北洋政府時期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書信祕密等基本人身自由權，直到1920年，胡適、陶履恭、李大釗、高一涵等《新青年》同人，仍必須發表〈爭自由的宣言〉，爭取「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該宣言亦詳盡列出，從1914年袁氏制定「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報紙條例」、「預戒條例」等至今尚未廢除，甚至在1919年變本加厲公布「管理印刷業條例」，把印刷業的營業自由完全剝奪，要求應即廢止。⁵⁶可見北洋政府的言論出版自由在袁氏過世之後，雖曾一度放鬆控制，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此時無政府派成員只好轉向南方，投靠駐紮在漳州的陳炯明，建立漳州文化運動模範區。面對政府當局不斷的政治壓迫，這股激進勢力不但逐漸形成，並且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1920年代中國重要的思想主流。

伍、社會革命的民主實踐： 1919年師復派在漳州的文化運動

從師復派的領袖劉師復早年訂定的心社12條戒約看來，包含不作官吏、不作

紹》，第3集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79年），頁456-457。

⁵⁵ 姜般若，〈寫在中興號卷頭的幾句話〉，《新生命》，1947年復刊，頁1。

⁵⁶ 胡適等人發起，〈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1日），收入李大釗著，裴贊芬編，《李大釗全集》，第3卷，頁516-519。

議員、不入政黨3條，即是不參預政治的實質內容，並非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而是以深耕民間的途徑進行社會革命，藉以反省民初中國的政治問題。而在劉師復的影響之下，五四時期的師復派無政府主義者，多專注於教育啟蒙方面，也從不同角度提出對北洋政府的質疑。

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核心是反強權，尤其反對政府的強權。關於對政府的批判，南、北政府從1918年開始和談，到了1919年底，師復派的相關報刊《新生命》發表〈南北有議和的必要嗎？〉一文，指南、北和議的虛妄性在於南、北政府所議的事情與人民毫無關係，完全是權力均分。議和分分合合未成定局，原因在於權力不均，議和謀求的是南北政府權利階級者的和，決不是多數平民的和。⁵⁷ 師復派已犀利地點出當時政治的關鍵問題，即政治成了少數政府權力階級的角力，與人民的幸福卻風馬牛不相及。不同於政客的政治角力，期間，師復派成員在陳炯明控制之下的漳州，透過教育訓練人民的公民參與，目的在於達成公民自覺，發揮在野的監督與批判力量。也就是說，師復派從社會革命的視角，透過教育達成國民政治的理想，試圖使漳州成為中國文化運動的模範區。

陳炯明駐紮漳州，透過革命黨人朱執信的構想，劉師復胞弟劉石心的居中引線，邀請師復派人馬至漳州，從而實踐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將閩南26縣建設成為一個健全的獨立自治區。⁵⁸ 陳炯明與師復派團體在漳州的改革，首先是書報的推廣，創辦《閩星日刊》及《閩星》半週刊，形成漳州文化運動。根據〈閩星報社啟事〉，說明這兩種刊物的分工，日刊多載世界要聞、地方要聞。至於時局問題、地方政俗，當以誠懇態度悉心批評，期盡指導人群默化社會之責。半週刊則為凡討論學理、介紹學說之長文屬之，以與日刊相輔而行。⁵⁹ 說明其採取啟蒙教化的方式引導人民對時政問題的了解，啟發人民對政治事務的自覺。

其次，在實踐策略方面，從梁冰弦的回憶錄《解放別錄》看來，他們在漳州形成一個獨立、武裝的自治區，區內集中全力於教育和生產，目的在引導民眾滌

⁵⁷ 萬生，〈南北有議和的必要嗎？〉，《新生命》，第4期（1919年12月），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409。

⁵⁸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頁12-13。

⁵⁹ 該文原刊自1卷7號《閩星》半周刊，徵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上冊，頁389。

除舊習，逐步轉向較為合理的生活；同時訓練人民參與實際政治，藉以打下民主化政治的基礎。對於師復派而言，民主是一種人民學習與參與的教育過程，藉由民眾意識的抬頭，使亂國的軍閥難以立足。因此，梁冰弦指出，革命的目標是雙重的，包含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經濟。⁶⁰ 因此可以理解到師復派以教育為革命方法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所理解的教育與革命是在於改變人民的日常生活、社會意識及政治意識，他們的任務正是教育，並激勵群眾實踐此一生活與意識。⁶¹ 然而最終的實踐者與完成者仍是民眾，是透過人民自己努力的成果，而非少數覺醒者成為民眾的代理人。⁶²

在此，也看到師復派不談政治的兩面性：一則依附特定政權，在當時對於過激派的嚴厲打壓，師復派等無政府主義者確實需要某種政治保護，因此他們也與軍閥陳炯明合作。⁶³ 此舉似與無政府主義者反政府、反強權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於此，可以從兩方面來思考：第一是私人關係。陳炯明之所以與師復派合作，與其早年思想及與劉師復的交情有關係；⁶⁴ 即使在劉師復過世後，也與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有所交往。⁶⁵ 因此，在特定時刻，彼此之間原有的思想差異往往因私人關係而模糊了，並且因共同的革命話語創造了彼此合作的契機。⁶⁶ 從陳炯明此

⁶⁰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22。

⁶¹ 阿里夫·德里克（Arit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頁27、214。

⁶² 這個問題之後演變為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批判，是以少數人行獨裁政治，見下文，〈評平民的獨裁政治〉，《民聲》，第23號的討論。

⁶³ 即使師復派有陳炯明此一保護傘，仍在當時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下，見〈外交部等為嚴密查禁漳州過激主義宣傳品傳播有關文件〉（1920年4-5月）稱：「現有鼓吹過激主義之小書多種，由福建漳州府印行，陳炯明司令實從中協助一切。」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頁65-66。

⁶⁴ 原來陳炯明當年與劉師復在辛亥革命前即共組暗殺團體，為革命黨人。惠州革命時即採用井字旗，已表示對古代井田制度的重視與社會主義的嚮往。俟廣州光復後，劉師復與莫紀彭等人在陳炯明代理粵督期間，即交往頻繁而密切。參見王聿均訪問，謝文孫記錄，《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頁26-27。

⁶⁵ 陳炯明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交往，尤可參看《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七、陳炯明與社會主義者的交往〉及〈附錄一、回憶師復〉等文，甚且此書中有幾近一半的內容與陳炯明有關。

⁶⁶ 例如莫紀彭在其回憶錄即指出這段往事為：「競存駐軍漳州期間，余等同志遂紛紛前往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用「襄佐」的字眼，而不直接用「從事」，更多是帶著私人情感性的襄助、輔佐之意，而此與共同的社會革命理念息息相關。見《莫紀彭先生訪問

時具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話語看來：「今後要全體人民議政，卻不要誰或甚麼階級專政，……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剝學步蘇俄。」⁶⁷ 與師復派不認同蘇俄階級專政路線的立場是一致的。其次，無政府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緊張關係，必須放在具體的時空情境下進行思考，特別是政權的擁有者陳炯明的政治屬性問題。當時中國在北洋軍閥割據，孫中山亦游離於政局的情況下，陳炯明本身即是革命黨人，閩南護法區為革命軍碩果僅存的軍力，此時兼具國民革命與新青年社會運動的雙重任務，⁶⁸ 具有延續清末革命命脈的正當性，更是新文化運動的實踐者（下節將作說明）；而非後見者在後來史觀的影響下，以軍閥的標籤來界定陳炯明。然而，無政府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於師復派成員而言，的確存在。因此，師復派與陳炯明在漳州的合作，到後來，師復派的核心成員梁冰弦（原擔任漳州教育局長）滿懷感觸，甚至要求陳炯明回復清白的平民身分，而遭陳炯明以權力的效用駁斥；等到陳炯明打回廣州，梁冰弦即另覓出路，擔任鐵路局職員，其他成員則繼續原有的工人運動。⁶⁹

另一則為社會革命的政治實踐。雖然師復派標榜不談政治，但從他們在漳州的實踐看來，其實正是透過社會革命的方式，從事政治改革的理想。根據《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中，如山〈游漳見聞記——漳州文化運動的真相〉一文指出，平等、博愛、互助為他們的精神信條，表現在當地文明制度的共產趨勢，與宣傳無政府共產思想的文章。⁷⁰ 從文中提及散播的小冊子包含劉師復的著作《無政府淺說》，⁷¹ 以及在運動會會場豎起劉師復的大像看來，漳州作為閩南護法區，實可

紀錄》，頁26。另外，阿里夫·德里克亦提及1912年後廣州無政府團體也與陳炯明保持了10年的密切關係，證明了個人聯繫在革命具體情境中產生的張力，不斷超越思想之間的差異。見氏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261-263。

⁶⁷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原載於香港《自由人》半週刊1952年11月連載16篇），頁14-15。

⁶⁸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12-13。

⁶⁹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27-31。

⁷⁰ 如山，〈游漳見聞記——漳州文化運動的真相〉，《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4號（1920年5月1日），版21-24。

⁷¹ 劉師復〈無政府淺說〉發表於《晦鳴錄》，第1號（1913年8月20日）。〈游漳見聞記——漳州文化運動的真相〉提到在場亦發一內容為〈無政府目的與手段〉的文章，應為劉師復〈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該篇發表於《民聲》，第19號（1914年7月18日）。嵯峨隆即將該文直接寫為〈無政府共產黨の目的と手段〉，見氏著，《中国黑色革

視為師復主義的繼承與宣揚。⁷² 此外，無政府主義者在漳州亦散發傳單〈救命呀〉、〈令子子孫孫有飯吃〉⁷³，提出「政府吃人」、「資本家吃人」，只有革命是救命的唯一方法。但此革命與從前不同，他們特別強調：不是從前的政治革命，不是「皇帝換過大總統的戲法」，只是改朝換代，換個名稱而已；而是社會革命，也是經濟革命，社會革命不但是救命的方法，目的也在「令子子孫孫有飯吃」。⁷⁴ 說明包含經濟革命的社會革命，在此超越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作為解決政治根本問題的良策。

據此，在師復派看來，民主不單是一個政治概念，更是一個蘊含社會概念與道德理想——平等、博愛、互助的整合體。此種思考模式的差異，稍後更具體表現於師復派與陳獨秀各自主導，同為社會革命的勞工運動。對於陳獨秀而言，勞工運動是奪取政權的手段，目的在於社會結構關係的改變，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師復派的目的在於勞工教育運動，教育與文化占首要位置。⁷⁵ 因而針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展開與此相關的國家、階級、權力的批判，在當時崇尚俄國政治路線與同為左派（同種異類）的立場中，實為提出思考俄國路線的獨特批判視角。

命論：師復とその思想》（東京：社會評論社，2001年），頁183。

⁷² 嵯峨隆，《中国黑色革命論：師復とその思想》，頁183。

⁷³ 如山在〈游漳見聞記——漳州文化運動的真相〉一文中所指的傳單為〈救命啊！〉、〈令子子孫斷斷不怕沒有吃飯〉，比對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選》所收錄〈無政府主義者在漳州散發的傳單選載〉為〈救命呀〉、〈令子子孫孫有飯吃〉。其中的細微差異有可能是〈游漳見聞記〉為遊記文章，為事後的補述，因此記憶較不完整。

⁷⁴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者在漳州散發的傳單選載〉，《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434-438。

⁷⁵ 誠如與師復派合作的陳炯明拒絕陳獨秀加入共產黨的邀約所言，現階段的中國勞動運動不能拿勞工做政治的本錢，一旦開了此一惡風氣，往後將不可收拾。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31-39。

陸、俄國路線批判： 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階級與權力

《閩星》的主編陳秋霖在〈國家的處分〉一文中指出，國家就是權力，歐戰正是暴露國家主義的罪惡，並列數國家的罪惡在於為「戰爭的導火線」、「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妨礙人類共同的生活」。⁷⁶ 當時中國軍閥政府的罪惡自然不在話下，然而俄國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亦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對之列。對於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言，其目的正是要去除國家此一中心，而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啻是形成另一新中心。稍後於《閩星》提出質疑的正是以《民聲》為陣地的師復派成員。

陳獨秀〈談政治〉⁷⁷ 一文發表後不久，1921年1月，陳氏在廣州法政學校以〈社會主義批評〉為題發表演說。⁷⁸ 陳獨秀在〈社會主義批評〉一文中為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定義，就是不許有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意思，這種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爭消滅有產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的道路。⁷⁹ 然而這種敵我分明的階級意識，卻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截然不同。無政府主義者將階級區別為勞動者與資本家，蔡元培的勞動者觀念則包含勞心者與勞力者兩種人，⁸⁰ 透過蔡元培、李石曾等勤工儉學運動，可以將勞動者變成知識分子；透過李大釗早期倡導知識分

⁷⁶ 陳秋霖，〈國家的處分〉，《閩星》，第1卷第7號（1919年12月23日），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420-425。

⁷⁷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頁1-9。該文的重要性在於不單是陳獨秀的思想變化，同時也預示《新青年》的內在性質的變化。相關討論可參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9-55。

⁷⁸ 由於〈社會主義批評〉一文批評了無政府主義，當時在座的區聲白於3天後寫信給陳獨秀，對他的批評進行反駁，區聲白致陳獨秀的信發表於《民聲》，第30號增刊，陳獨秀也3次復函答辯，均刊載於《廣東群報》，後來集中發表於《新青年》，第9卷第4號〈討論無政府主義〉。另外，《民聲》也發表多篇文章反駁陳獨秀的主張。

⁷⁹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頁12。

⁸⁰ 蔡元培，〈勞工神聖〉：「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總頁439。

子到民間去的主張，可將知識分子變成勞動者。⁸¹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除了區分為勞動者／資本家之外，將勞動者進一步區分為勞心與勞力者，目的在於兩者之間產生位置的倒轉，階級的對立。⁸² 此時勞動者的意義窄化為無產階級，有產階級包含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因而極力主張無產階級革命，進一步奪取政權，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極力抨擊的階級特權。

換言之，階級概念在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中是流動的概念，透過勞動神聖、全民勞動，最終在於泯除階級意識，達成「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而馬克思主義是以階級對立、鬥爭的政治形式，達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又以此一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許諾未來廢除一切階級的必要手段，而將之合理化。⁸³ 《民聲》即針對此一問題，指出階級鬥爭應是使支配階級與平民立於平等地位，而非再製造一新的支配階級。⁸⁴ 因為「無產階級推翻資本階級和保障資本家的貴族階級之後，自己即躍登政治臺上，行使政權，這時候至尊無上的執權者，Dictator 其實已經不是平民了。」⁸⁵ 在《民聲》的立場看來，「什麼『階級專制同一人或一部分人專制』這些話，事實上已經告訴我們是偽的了。」⁸⁶ 無產階級專政仍是不折不扣的專政，仍是少數者的英雄主義，可能的弊端是生出少數者的壓制，因此認為少數自覺者應當只要擔任喚起民眾的責任即可，真正進行運動的是民眾

⁸¹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原發表於1919年2月20-23日《晨報》，收入李大釗著，裴贊芬編，《李大釗文集》，第3卷，頁179-183。

⁸² 例如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一文指出，將古人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概念倒轉過來，成為「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頁2。

⁸³ 例如從無政府主義者轉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瞿秋白曾言：「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新時期的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見瞿秋白，〈多餘的話〉，《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多餘的話》，頁328。

⁸⁴ 〈評平民的獨裁政治〉，《民聲》，第32號（1921年5月15日），頁3。

⁸⁵ 〈無政府共產派與集產派之歧點〉，《民聲》，第30號（1921年3月），頁12。

⁸⁶ 〈「階級戰爭」和「平民專政」果適用於社會革命嗎？〉，《民聲》，第33號（1921年7月），頁5。

本身，否則就容易產生夾雜權力的政治慾。⁸⁷

以上是《民聲》針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與權力問題。其次是馬克思原典的無產階級專政，引發政治形式／狀態的詮釋問題。陳獨秀在〈社會主義批評〉一文中指出：

柯祖基著書大力攻擊俄國底無產階級專政，說不合乎民主政治，說不是馬格斯主義；其實馬格斯在《哥塔綱領批詳〔判〕》中明白的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社會底中間，有一個由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變形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政治上的過渡時代就為必要。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時代，不外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獨裁政治。」⁸⁸

這裡產生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無產階級底革命的獨裁政治」的意涵。在〈社會主義批評〉一文中，並沒有針對此一問題多作說明，我們看到的是陳獨秀直接接受列寧詮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並沒有針對柯祖基（按：考茨基（K. Kautsky, 1854-1938））的反駁多作說明，誠如該文結尾所強調的「在俄國才還了馬格斯底本來面目」，已點明陳氏的立場。而針對考茨基的觀點，據以指正列寧誤解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說的原義的，正是師復派的《民聲》雜誌。

《民聲》〈論平民的獨裁政治〉一文中首先引用考茨基⁸⁹對俄國革命的描述，指出俄國雖說是平民的獨裁政治，實在「多數派（按：布爾什維克黨）一黨的獨裁政治」，並且是一黨中少數指導者的階級，就是平民的革命的獨裁政治。該文中，考茨基繼而指出列寧誤解馬克思的「平民獨裁政治」，所謂獨裁政治，實在有兩種區別：一種是作為政治「形式」的獨裁統治，一種是作為「狀態」的獨裁統治。馬氏說的是後者，在「狀態」上指為獨裁統治，也就是「平民趨向資本主義制度爛熟一方面，其數漸次增加，從政治上德模克拉西得了優勢，自然成了平民獨裁政治的狀態」；而列寧卻把它解讀為「形式」上的「權力集中」的獨裁統治。⁹⁰

⁸⁷ 〈評平民的獨裁政治〉，《民聲》，第32號（1921年5月15日），頁3。

⁸⁸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頁12。

⁸⁹ 該文譯者為科特克，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

⁹⁰ 〈評平民的獨裁政治〉，《民聲》，第32號（1921年5月15日），頁1-2。

《民聲》的語句有些饒舌，在此可以透過考茨基的著作《論無產階級專政》更能清楚他的意思。考茨基認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平民獨裁統治）在《法蘭西內戰》中，是以巴黎公社為藍本，是在純粹民主制度下必然產生的一種狀態，因無產階級占絕對多數；而不是以解除反對派的武裝，剝奪反對派的選舉權和出版、結社自由的政府形式的專政。⁹¹ 而《民聲》選擇考茨基的角度正在於批判列寧的無產階級獨裁專制，引發個人自由與民主權被剝奪，以及少數專制的問題，尤其是列寧將社會革命摻雜政治革命，也引發無政府主義者的強烈質疑：

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就沒有別的麼？雖稱社會的革命，也要帶政治的革命色彩，這是甚麼道理？革命越是政治的越暴虐。⁹²

這裡聯結的核心問題在於雙方認定的社會革命本質為何？支配與被支配者的角色置換是抵抗還是壓服？如果是壓服，是否有可能產生以暴易暴的危險？此一相關問題的思考，在區聲白與陳獨秀的論戰中，有進一步的討論。

陳獨秀在〈社會主義批評〉中指出自由與聯合互相矛盾，在答覆區聲白的信中，他認為權力集中是革命的必要手段，即是抵抗的無政府主義也必須使用強力或壓服（不管是多數壓服少數，或少數壓服多數）。⁹³ 區聲白據此反駁，並進一步區別抵抗與壓服之不同，區聲白認為抵抗是把被人奪去的權利取回來，壓服是要把他人的權利據為己有，壓服只呈現在單方面意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因此區聲白不能苟同此以暴易暴的辦法。⁹⁴

從以上雙方的說詞來看，在陳獨秀看來，壓服是一種手段，以達到對抗，甚至推倒資本階級的目的，為了達成目的，壓服是必要之惡。類似的邏輯其實也出現在陳獨秀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為了達到共產社會的最終目的，獨裁統治是必要的手段。因此，陳獨秀贊成壓服，區聲白則反對此一以暴易暴的方法。

⁹¹ 考茨基 (Kautsky, Karl) 著，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4版），頁24。相關討論可參見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296、297、353。

⁹² 〈評平民的獨裁政治〉，《民聲》，第32號，頁3。

⁹³ 陳獨秀再答區聲白，〈討論無政府主義〉，《新青年》，第9卷第4號（1921年8月），頁14-15。

⁹⁴ 區聲白再答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新青年》，第9卷第4號，頁19。

關於以暴易暴，其實已經牽涉到兩者之間社會革命的核心本質的差異。區聲白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要將階級位置代換，勞動者不工作，而資本家卻做勞動者的奴隸，這真是以暴易暴；唯有透過自願的聯合才能實現，在革命進程中改變社會意識，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⁹⁵ 此一思考亦可參照師復派同人梁冰弦在回憶錄中的看法。梁冰弦指出，他們相信將來是為公道而推行社會革命，大眾亦知擁護公道；如果自己又用暴力侵奪自由，那麼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因而他們雖敬佩俄國的革命，卻不同意俄國革命後政府的治權侵奪了人權。⁹⁶ 如此一來，在壓服、以暴易暴的思維底下，凡與之方向不同的人或階級成為敵人、對立的階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革命的後果不是去除中心，而是成立了更鞏固的中心——少數專政的局面，而這正是陳獨秀〈談政治〉一文的核心思維。

區聲白除了反駁以暴易暴的社會革命，提倡自由的聯合外，亦明確地表示，反對將俄國制度不經揀擇地完全搬到中國來，其實亦基於中國當前政治環境的思考。辛亥革命後，人民飽受軍閥戰爭的痛苦，即是拜中央集權之賜，而如今卻要仿效實行中央集權的俄國，雖然美其名為勞工專政，但是究其實只不過是「共產黨專制勞工」，因為專制必產生集權。然而，陳獨秀強調國家權力使用者善惡的動機，卻忽略了權力本身壓迫的本質。因此區聲白直言：「革命應該消滅的不僅是壓迫者而且還是壓迫本身，因為只要壓迫存在，誰壓迫就不重要。」⁹⁷ 陳、區的差異，在於兩人對於解決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辦法不同，在1922年下半年寫作的兩篇文章中不約而同地談到中國的時政問題，體現兩種派別不同的思考面向與解決途徑。

陳獨秀在〈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一文裡，認為中國政治分為3種狀況：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國內軍閥的擾亂、政黨的萎弱不足以支配中國政治。中國作為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立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上，唯有權力才

⁹⁵ 1921年下半年，區聲白到法國留學，在法國回覆給陳的第四封信〈答陳獨秀君的疑問〉，原載於《國風日報》副刊《學滙》，第104-109期（1923年2月），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658-659。

⁹⁶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21。

⁹⁷ 區聲白，〈答陳獨秀君的疑問〉，原載《國風日報》副刊〈學滙〉，第104-109期（1923年2月），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648-664。

能代替權力，無權力則無國家政治可言，因此要去除軍閥的權力，必須仰賴人民有權力。然而權力必須透過組織才能運作，在政治上就是政黨，也就是人民組成強大的政黨，才能打倒軍閥，反抗帝國主義。⁹⁸ 陳獨秀的思考其實一直維繫袁氏稱帝後人民主權的思考，但他重視的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包括反對、抵抗政府專權的權利），而不在於對權力本身（包括政府的與人民的權力）做制度性的限制。⁹⁹

然而，區聲白〈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一文，卻從權力的壓迫本質著手，去解構國家、政府、法律相生共構的關係，提出以社會革命解決政治問題的新思考。區聲白首先一點名批判當時政壇、學界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途徑：其中有聯省自治的各省軍閥，不過是少數軍閥欲利用之以割據地盤；有好人政府的學者胡適、蔡元培，在當前好人政府組閣的情況下，比起徐世昌時代也相差無幾；也有提倡馬克思主義，力倡普通選舉的陳獨秀，¹⁰⁰ 在金錢政治橫流下，何嘗選出真正的人民代表？區聲白認為問題在於政治制度把全國大權集中於少數人手裡，而大多數的民眾毫無自由參與的機會，所以必須削減國家之權力，以至於最小限度，也就是採取市民自治的方式。¹⁰¹ 其實在稍早（1919年），師復派在漳州所推行的文化運動，已用類似的方式加以實踐。

如果把市民自治放在1922年的時代脈絡來看，當時知識界與軍閥推動以省自治為基礎，仿聯邦制的聯省自治運動，胡適等人皆在贊成之列；另一派則看出聯省自治的官治本質，主張真正的自治，是排除官方的參與，由人民透過職業團體組織來治理自己，也正是五四運動以後國民自決精神下的產物。¹⁰² 區聲白的市

⁹⁸ 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收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67-470。

⁹⁹ 楊芳燕，〈道德、正當性與近代國家：五四前後陳獨秀的思想轉變及其意涵〉，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年），頁372-373。

¹⁰⁰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一文中指出，「吾人主張用普通選舉法選舉而不為軍閥勢力所支配的新國會」，收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頁489。

¹⁰¹ 區聲白，〈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民鐘》，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頁635-636。

¹⁰²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

民自治理念也必須放在後者，即當時知識界反對軍閥政治，主張人民自治（有別於官治）以解決國家政治問題的一環，此一脈絡來思考。而區聲白的人民自治理念也正說明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關懷——透過民治，讓人民自覺參與國家重大政策與公共事務，才能確保中國長治久安。

柒、結論

從上述師復派同人的主張看來，他們絕非是「躲在老婆房間讀紅樓夢的社會革命者」，¹⁰³ 而是透過社會革命的實踐途徑解決中國的時政問題。縱使在民國初年，報刊雜誌嚴格管控的年代，面對種種的政治風險，甚至被貼上過激派的標籤，他們的刊物仍然能透過各種變形和偽裝，努力在夾縫中求生存，傳播思想。並且在五四運動期間，雖然實踐的時間不長，但在當時南北分裂，多數知識分子還停留在辦刊宣傳的階段時，他們早已化為具體行動，透過教育和人民參與民主的訓練過程，具體實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社會，使漳州成為文化運動的模範區。因此師復派不問政治的主張，並不是對政治漠不關心，而是希望透過教育與文化等社會革命的意識改造過程，達成此一任務。

無政府主義者對政治的定義，可以從早年劉師復對張繼做官一事大肆批評，並與吳稚暉進行爭論；¹⁰⁴ 以及後來北伐革命期間，內部關於革命運動是民眾革命與領導它的政黨作一區分，¹⁰⁵ 可以知道他們對政治的定義集中在做官、政黨政治。從區聲白的〈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一文中，對中國時政問題的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223-224。

¹⁰³ 受陳獨秀影響的青年，送給廣州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尊號：「躲在老婆房間讀紅樓夢的社會革命者」，見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35。

¹⁰⁴ 劉師復，〈師復致吳稚暉第一書〉、〈再至吳稚暉書〉，《晦鳴錄》，第2期（1913年8月27日），頁7-11。

¹⁰⁵ 1926-1927年，無政府主義者針對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進行了兩場討論。核心問題在於無政府主義者應對其理想進行學究式宣傳，或參加革命以指導革命朝無政府主義的目標發展？而後者必然牽涉到如何參加以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詳細的討論可參看阿里夫·德里克著（Arif Dirlik），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頁237-238。

關注溢於言表。無政府主義者反強權的主張與落實於教育、民主理念的實踐，使得社會革命意謂著政治改革的一種新力量。但他們又不贊同俄國馬列主義，在階級、國家，以及權力的主張上，他們反對階級壓迫，將其視為一階級強加於另一階級的強權，也就是新支配者取代舊支配者產生的新壓迫。

無政府派與馬克思主義者早期雖有短暫的「安馬合作」（社會主義同盟），¹⁰⁶ 然而無政府派進行純粹的工團主義運動，由於面臨嚴苛的政治現實，導致之後與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領導權之爭奪，漸居下風。其次，無政府主義的基本主張：反強權的工具為政府與官吏，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無政府派成為軍閥政府眼中的過激派，壓縮無政府派的生存空間，也導致他們必須依附在某種政治權力保護傘下，上文所提陳炯明的漳州新政即是一例。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反強權——尤其是政府強權，當時的確存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緊張關係與複雜張力。1920年以降，隨著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臺競逐的形勢日益鮮明，往後的問題成為無政府派與當前政黨間政治距離的問題。第一代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的（國民黨）護國救黨運動，與第二代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第三代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因而產生激烈的爭論，等到國民黨北伐成功，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衰敗已成定局。¹⁰⁷

回溯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無政府主義發展的獨特脈絡。如果說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是針對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反撥，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在地化脈絡，則是因應中國政治環境的發展而產生的政治解決方案。作為民初中國最富盛名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師復派不但提出了社會革命作為民主政治的思想、概念延展及實踐的可能性，更提供一種用來思考中國革命發展不可或缺的視角。尤其針對政治、權力與階級開展而來的相關批判，師復派無政府主義者較早是與辛亥革命、袁氏

¹⁰⁶ 根據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在1920年春，留守晦鳴學社的鄭佩剛，接到一封布爾什維克黨人用世界語寫的信，署名是布魯威。當時鄭佩剛將信寄與北大黃凌霜，黃凌霜約同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在天津敘話幾回，結果產生一「社會主義同盟」。參見《解放別錄》，頁8。對於「社會主義同盟」相關研究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見曾慶榴，〈無政府主義與廣州共產黨之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125期（2011年6月），頁84-86。

¹⁰⁷ 更詳細的討論可參看坂井洋史，〈二十年代中國安那其主義運動與巴金〉（節選），收入凡晨編，《巴金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頁196-211。

擅權、二次革命、軍閥割劇的時代命題相扣，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提出以平民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超越與再造；之後與同為左派陳獨秀等人的論難過程中，對於中國未來道路的去從問題，更提出俄國路線的獨特批判視角。

民初劉師復派無政府團體，就像一顆亮眼的彗星，劃過晦暗的夜空，照亮了混沌的中國大地。縱使1920年代以降，他們在嚴峻的政治現實下漸趨沒落；然而他們的理念與行動，在歷史滔滔的洪流中，反而有如一罇陳年好酒，留給後人進一步發掘的思想遺產。也許可以這麼說，無政府主義者在這段歷史過程中的播種耕耘，在往後國民革命及國共兩黨在中國政治舞臺的逐鹿爭鋒，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另類思考，對於思考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尤具啟迪的意義。

徵引書目

一、報紙期刊

- 《公言報》，北京，1917年。
《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北京，1920年。
《申報》，上海，1913-1916年。
《民聲》，上海，1914-1921年。
《自由錄》，上海，1918年。
《努力週報》，北京，1922-1924年。
《每週評論》，北京，1918-1919年。
《時事新報》，上海，1917年。
《新生命》，天津，1919年、1947年復刊。
《新青年》，上海，1915-1922年。

二、專書

-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香港：三聯書店，1979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學生書局，1964年再版。
王聿均訪問，謝文孫記錄，《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全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考茨基 (Kautsky, Karl) 著，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臺北：黎明文化，1980年4版。
- 李大釗著，裴贊芬編，《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
-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合肥：安徽教育，2005年。
- 海隅孤客 (梁冰弦)，《解放別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 張九海，《執著的烏托邦追求——劉師復無政府主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冊、中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 嵯峨隆，《中國黑色革命論：師復とその思想》。東京：社會評論社，2001年。
-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
-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鄭佩剛編，《工人寶鑑》。上海，民聲社，1917年。
- 鄭佩剛編，《民聲叢刻》。上海，民聲社，1917年。
- 瞿秋白，《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多餘的話》。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

三、論文

- 曾慶榴，〈無政府主義與廣州共產黨之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125期（2011年6月）。
- 楊芳燕，〈道德、正當性與近代國家：五四前後陳獨秀的思想轉變及其意涵〉，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年。
- 蔣俊，〈民國初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國哲學論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
- 坂井洋史，〈二十年代中國安那其主義運動與巴金〉（節選），《巴金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